

话语创新催生“思想中国”

潘 涌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金华 321004)

【摘要】 中共中央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出发,空前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创新。话语创新必将催生一个全面、高度、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国”。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中国”相较于物化形态的“现实中国”而言,是指秉持自由创造信念、洋溢思维灵感和深度创新活力的东方精神强国及其象征的“中华文明”当代新形态。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现代历史的文明演进,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诸多显著业绩,已经证明话语创新是一种顺应时代需要的必然历史逻辑。反思哲学社会科学界,确实存在着诸如表达力衰微、批判力丧失和解释力走弱这种种现实的“话语问题”;需要警觉的是:“话语问题”淤积之“弊”将阻碍全社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文化创造力的喷发,无益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长远积累。当前创新理论学术话语,亟需转换理论学术研究主体的语用范式,鼓励从消极语用走向积极语用的新境界;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基本的思想原则,彰显研究主体在创新话语过程中的独立人格、思想品位和表达个性。一方面可以从主观上强化学术主体的创新理念、坚定其创新行为、拓宽其创新思路、优化其创新方法等环节着眼;另一方面可以从改善学术文化境遇、提升学术评价机制、构建学术成长平台等外在方面入手。转换语用范式,将有效促进研究主体思想创造力的大释放,实现“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创造性升华。

【关键词】 话语创新;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语用范式转换;“思想中国”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6)05-0033-13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①——习近平主席5月17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并发出以思想理论兴国的时代强音,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倍受鼓舞。在透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及其发展时,他特别指出“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的时弊^②。这是一个值得学界深入反思、自觉祛蔽的深层问题。

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国际作用的日益彰显,文化软实力“欠硬”现象与之形成比较明显的反差。尤其是深具东方特色、获得全球公认的成长性和普适性“中国话语”的长期匮乏,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广泛关注、值得忧思的一种现象。这种富有创意的“中国话语”

之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目前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制约社会潜在思想创造力喷发的“瓶颈”之一,更是直接影响到作为“经济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应有话语权的发力。而软实力不“硬”,硬实力则“软”。因此,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反思传统话语范式之“弊”、探讨话语表达如何深度创新,当对进一步深入解放思想、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新发展乃至当前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具有不可低估的多层面的积极意义。

一、“话语”溯源与“思想中国”的价值内涵

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博弈的特定背景下,近年来中国政界和学界持续关注作为高频度术语的“话语”。对“话语”的关注和对“话语问题”的焦虑,当

【收稿日期】 2016-05-27

【基金项目】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强国战略研究”(2013GH026)。

①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第1版。

然不仅仅是因“话语”作为一种语词本身,更是因为“话语”所承载的意义及其派生的影响人类思维流向的“话语权”消长。既然“话语”是一国文化软实力(soft power of culture)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话语的持续生产、创新及其影响力的逐渐扩散,则标志着该国文化软实力的深远成长趋势,因此,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影响力的国际大型智库普遍重视“话语”的生产和输出。这种情形,就构成了当代中国应当而且必须重视“话语问题”的宏观全球战略背景。任何“新话语”的产出及其渐进性传播,自然同时形成某种新观念乃至新思潮的勃兴及其盛行,助推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即“发展性思维”的可持续走强,从而对特定时代的文明成长和社会兴盛产生不可估量的深层影响。“话语”更新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人类思想成长和发展的缩影史。这种情形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知识和思维更新周期的空前缩短而日趋显著。因此,只要怀抱振兴中国文化的伟大梦想,就不能不正视“话语问题”的严峻性、不能不焦虑“话语创新”的紧迫性。

2013年8月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①。这在当时思想理论界激起很大共鸣,并引发哲学社会科学界反思“话语问题”的新风潮。之后,在12月举行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座谈会上,中宣部领导从落实习总书记指示精神出发,要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圆“学术自强梦”而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明确纳入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之中^②;这次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同时从中外文化博弈、改变西强我弱的战略高度阐释了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国际学术文化交往中的话语权问题^③。这些引人关注的新近事实表明:在近年学界自发内省和研讨的基础上,党的领袖和职能部门的领导正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开始自觉引导对“话语问题”的重要反思和建设性前瞻。

一段时期以来,“话语创新”之吁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积极效应持续发酵,甚至形成了不同学科背景、不同思维观念和不同辈份学者竞相争开纾解“话语之忧”药方的热闹景观。事实上,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迅速演进,从中央领导到专家学者早就开始形成对话语表达达到思想观念创新的深切期待。早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就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④尤其哲学社会科学界已经达成一种不约而同的殷殷共识: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某些传统话语和不相宜中国国情的某些外来话语及其表达范式,已经成为一定程度上制约哲学社会科学思维创新的桎梏性“瓶颈”,并导致理论学术界悄然滋生的那种“创新焦虑”症不时蔓延。当然,与此前不同的是:近期浮现舆论界的“话语之忧”,昭示着哲学社会科学界关于理论创新与学术探险的建树意识更加自觉。因此,从国家文化创新性发展、思想进一步解放的宏观视角来看,这种对话语“创新焦虑”的积极意义显然应当格外看重并珍视。

“话语”(discourse)原指特定社会语境中人际思想交流而通过口头或书面表达出来的言语行为。但是,显然“话语”不只是停留在语义、语法和词法层面上的语言学的专门术语;作为最初是福柯“话语理论”中的核心词并后续扩展为西方哲学思想界学术表达的流行词,“话语”已不同于索绪尔语言学中静态的“语言”(Language)或动态的“言语”(Parole),而构成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二元论的自觉超越。作为西方现代思想史上福柯首提的专门术语并得到回应和传播的“话语”,更多蕴涵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这种意义,源自语用学关于话语产生的环境(situation)或语域(register)的若干基本元素:即生成话语“意义”(meaning)的话题、时空背景(情景)、交际意图与交际主客体的关系^⑤。换言之,“话语”的意义是由一般语词语义与特定语境

①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② 雒树刚:《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18日,第A03版。

③ 王伟光:《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20日,第A03版。

④ 江泽民:《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⑤ 何自然:《语境新论》,何自然主编《语用学探索》,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192页。

交互融合后而生成的,是话语主体与客体动态关系的精神产物。这样,“话语”主要是哲学思想研究中“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语用学”而非“语义学”的一种概念。正因如此,在福柯阐述语境中,“话语”与动态“陈述”一词紧密相连^①。从中表现出在历史演绎中研究主体对思想意识不断探秘的努力。

因此,本文主要从语用学立场出发界定“话语”并以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的跨学科学术视野来探讨“话语问题”。论题中的“话语创新”(discourse innovation),是指针对“中国问题”而在具体语境中创生的具有新颖、鲜活和深刻诸品质、充满现实思想意义的言语表达行为。“话语”的外在形态分别呈现为“关键词”、“中心句”或“精彩语篇”。就语用单位而言,“话语”既指结构完整、表意明确、功能充分的独立“语法单位”(句子),也包含置身具体语境中虽无完整语法结构、却有独立内涵和独特使用功能的“意义单位”(小于句子,如词语或短语),甚至或者是大于句子的言语作品(段落或篇章);就语用性质而言,本文“话语”重在以逻辑理性见长的学理性言语行为;就语用主体而言,既有代表国家意志、昭示中国改革与发展路向的领袖政治话语,更有覆盖哲学社会科学界各领域、各学科从事相关学术研究并置于宪法框架内、符合国家最高利益的学者个体言语行为。这样,本文语境中的“话语创新”等同于特定背景和具体语境中的创造性“言语行为”,包括积淀着人文思想内涵的新概念、新范畴和动态生成的新判断、新命题。其中,“概念”是对人的特定实践活动本质的深刻揭示,而经得起推敲的“新概念”更是对社会矛盾、现实问题和事物本质的发展性的高度概括;一个内涵深刻、意蕴丰富的新概念往往就成为凝聚时代发展性新思维的基本元素和即将诞生的新思维体系的重要载体,并且在“新话语”体系中占有标志性和决定性的地位,自然成为话语主体深入论证思想观点、趋向学术更高境界的逻辑起点。简而言之,提炼新概念就是形成新表述、建构新思维的必要开端,也是本文语境中“话语创新”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尤其应该看到,话语不只是脱离“中国语境”的狭隘、单纯的语用行

为,特别是在话语研究趋向多学科融合、作为新兴综合理论学科的“话语学”呼之欲出的学术背景下^②,“话语”本身烙上了愈来愈浓重的社会政治色彩,是全球化时代文化软实力博弈的精神产物。由是言之,本文语境中的“新话语”无疑就是一种文化创造力量的结晶,至于浓缩为一种新概念或新表述、象征着一种新观念的“中国话语”,自然是“中国思维”乃至“中国理论”的“助产婆”——古今中外,人间至文,当以话语核心的创新为始,以思维体系的创新为终。就此而言,唯有话语创新,才能催生一个焕发创造智慧、洋溢建树活力的崭新的“思想中国”。

话语创新催生“思想中国”——这是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一个颇有探索价值的艰难的时代命题。构建释放思想活力的合法语言机制,其要义之一就在于提炼理论学术各学科领域具有创意的“新话语”并使之趋向成熟的新体系。从思维发生学来观照,话语与思维在人类进化历史上天然具有互为依存、有序更新的逻辑关联。新思维的最初萌动内在地需要新话语的表达,而新话语的形成则完成新思维的诞生,此后就是新思维在与实践互动中日益走向成熟、丰富和深刻。人类文明演绎的本质就是源自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与思维之间的循序轮动和有机升华。如此循序往复的螺旋形上升,逻辑地促进人类文明历史的进化。正因如此,文化开放时期具有探索精神的思想先驱们,常常将以新概念与新命题为核心的“新话语”视作思维登高运动的基本“抓手”而不断攀援;同时,这些“新话语”又成为思想先驱们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深刻表征。由是言之,创造新的文明和新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是从创造“新话语”开始——实现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梦”,需要通过“新话语”的创建及其体系化的发展来更深广地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全面激发社会精神生产各领域的创新活力,并使之源源不断地传导到物质生产各领域中。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中国”,是与物化形态的“现实中国”比较而言的,前者指秉持自由创造信念、洋溢思维灵感和深度创新活力的东方精神强国及其象征的“中华文明”当代

① [法]米歇尔·福柯:《话语的形成》,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第2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2页。

② 陈汝东:《论话语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34—135页。

新形态。国家的发展,无疑有赖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者同时走强,而以新话语催生的新思维则是引领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软实力”。因而,如果“现实中国”侧重指国家物质文明建设的充分发达,那么,“思想中国”其内涵重在国家精神文明创造的高度繁荣,尤其是活力横溢的新观念和新命题的层出不穷。这具现为以“新话语”为象征的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汉语精品之不断问世——唯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大指标的同步达成,才标志着具有厚重历史积淀的古老中国真正全面焕发出全球化时代的蓬勃生机。因此,在“思想中国”这个不无探索意味的新概念中,蕴涵着对当代中国曲折成长过程的积极和建设性的理性反思,包含着对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重要一极的“中华文明”走向全面、高度与和谐发展这种理想境界的深切期盼。

如上内涵的“思想中国”将标志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新发展,必然具有下述基本价值特征。第一是思想的开放性。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开放“和而不同”、自由竞争的多元思想空间,使主流与支流、传统与前卫、精英与民间等多种声音获得“百家争鸣”的平等契机,借助平和与理性的话语交流而释放思维能量、引发创意灵感。第二是思想的发展性。凡是富于思想力的国度,必然珍视“万类霜天竞自由”这种优质精神文明生态,激励最优秀的思想者善于及时总结、概括和提升源自社会变革实践的宝贵经验,从而长葆新观念、新思维生生不息这种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活跃恒态,甚至引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是思想的创新性。这是未来“思想中国”的本质特征。思想的开放性和发展性最终指向创新性价值的完满达成。唯有充盈思想的创新气息并以批判和反思为荣、以建树和创造为本的伟大国家,才能持续超越原有文明形态、开启文化振兴并高度繁荣的新里程和新境界,闪耀出与人类其他文明形态并存共荣、互补多赢的理性光辉。当中国社会的发展获得了与经济增长相称的饱满的文化内涵,世界全球化的历史才是揭开了真正具有

“中国主题”的崭新篇章;曾经被人戏谑的技术主义“中国制造”将终于升华为自辟前景、独具新意的“中国创造”,充满世界意义的“思想中国”将终于步入人类创造史的伟大格局。

二、话语创新的历史逻辑： 新话语推动社会进步

“话语创新”问题是在中国社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之际凸显出来的。由相对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扩展且深化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各大领域的综合改革,这种国家改革与发展战略的重大变化深刻地凸显了新一轮“深改”的全面性和前瞻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更将其细化为十五个方面的具体实施纲要。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度转型,必然要求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各种环节的改革作出同步配套的跟进,避免单一改革可能导致的新问题激发社会各阶层的新矛盾和新冲突,真正降低改革可能遭遇的不必要的风险成本。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不仅要求市场资源的最适当调配,更是亟需社会各阶层的和谐流动与社会结构的合理调节,从而如《决定》所要求的那样“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①。《决定》所展示的改革远景鼓舞人心,但是“深水区”的改革必然要求疏理“浅水区”改革所遗留的阻碍思想通道的“淤塞”——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瓶颈制约”。

思维观念的创新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前提。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②即使是作为指导社会进步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也存在着一种“再创新”的内在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的封闭的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③既然如此,就要求以新话语及其承载的新观念来进一步释放人们心灵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6日新华社电,第一部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

②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③ 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学习》,《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深处强大的思想力量,以创造性的思想力量来驱动人们的社会实践行动,进而开创社会文明发展中承前启后的新里程和新境界。这里,语词、概念和判断三者之间存在着循序互动、渐次推进思维深入的辩证关系。语词是概念存在的符号形式,概念则反映事物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定;当指称特定对象的新语词出现时,就是新概念、新判断萌芽之际,但是,此时语词形式与概念内涵之间未必深度“磨合”;此后,伴随主体实践运动和思维运动的不断进展,语词与概念之间逐渐“磨合”;这种持续“磨合”的本身,就构成了主体“深入研究”的曲折过程,于是在这过程中由灵感的触发而可能诞生更精准、更丰富和更深刻的真正新概念,并形成突破旧观念的创新性判断——由此而展示出思维生长的可持续前景。概而言之,新思维的萌芽产生了新概念问世的内在需求,而新概念的问世则促进话语主体自身(即研究主体和表达主体)和社会思想深入、普遍的大解放和再创造,促进国家的精神创造力和物质生产力突破瓶颈制约而强势喷发乃至更深远的释放。这就是“话语创新催生‘思想中国’”这个时代命题的真正内涵和本质规定。这个命题的基本精神不但顺应理论学术研究各领域发展的历史逻辑,更深度契合社会文明的宏观演绎规律。

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以“科学”(science)、“民主”(democracy)这种由西方输入、中国历史上从未呈现过的新话语洗涤被旧文化、旧思维蒙蔽数千年的民族心灵,开创了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五四”运动先声。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作家们的新文学创作,到中国共产党等新兴社会党团组织的救国革命运动,展开了一场从新思维到新实践和新体制的对现代化的自觉追求。更具有说服力的是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新时期:全国理论思想界以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开启序幕,并由此而发动了以“解放思想”为话语标志的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在这种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诸多问题以全新话语作出了一系列精湛的表述,诸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等朴素而蕴含深刻哲思价值的政治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哲学

新命题,以及南方谈话中所推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的新范畴——它们作为定格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新话语”,深远地敞亮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征途,释放出全民族、全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热情,短时间内创造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迅速崛起的历史奇迹——经济学家甚至将这种以“解放思想”来促进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基本原理提炼为“Ideas 增长模型”^①,因为这是区别于资本、劳动、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的“无形要素投入”,并给作为蕴藏世界上最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带来经济发展的巨大“规模效应”。可以更明确地说,上述承载新时期新观念的诸多口耳相传、思想含量深厚的新话语,已经成为曾被极“左”政治思潮引入歧途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最享受、最启智的公共精神产品,并且具有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上的可持续增长价值。因此,它们逻辑地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象征。放眼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创意概念和颖表达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效应更是不胜枚举。罗马国际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所用“可持续发展”概念之于地球资源有序开发与人类生态和谐发展的反思性警示,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首创文化人类学“后喻文化”新说之于人类文明演进范式的揭示,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著名箴言“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对培育人类理性精神的永恒启迪和智慧省思等等……从中我们可以深远地感悟到:凡是凝聚了深厚思维含量的新话语,必然能够在一定时代条件下转化为一种无与伦比的社会进取新动力,有的甚至以持续释放出来的强劲思想能量而引发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精神上的“核裂变”,最终汇合成民族进步与人类文明演进的意志力和行动力——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应当致力于打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必然历史逻辑。

今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之际,创新理论和学术话语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当然职责。展望国际世界,人类全球化进程正在向纵深持续发展,源自不同意识形态和种族文化的“话语博弈”鲜

^① 胡鞍钢:《中国迅速崛起的思想密钥》,人民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318/c40531-24667140.html>。

明地反映在各个领域的国际交往中,尤其是“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所强势承载的西方文化价值体系通过网络高速公路辐射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对植根深厚历史传统的东方文化构成了危机和契机并存的严峻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话语软战争”。它关系到国家在世界文化博弈中的话语权力和国际形象,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文化发展的道路和走向。因此,唯有把握时代趋势并从理论学术的各个领域趟过“深水”、创新话语,才可能带动全社会的思想创新和文明进步,在持续释放全民族精神创造活力的过程中催生一个智慧勃发、活力四射的“思想中国”。

三、话语创新的现实逻辑： “话语问题”及其痼弊

伴随着当代改革实践进入“深水区”所暴露出来的“瓶颈”制约,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新观念对传统思想禁区突破的迟滞,是位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上层建筑探索力度的走弱,从而束缚了经济基础改革的实施力和行动力。当代改革进程所创造的诸多奇迹已经表明:只要洒一缕新观念的阳光,就能使中国社会活力四溢、发展辉煌(正是新时期农村政策的有限放宽,才使安徽省肥西县小井庄农民完全可能发起1978年9月包产到户的自改革,而这场最早的小小变革则开启了中国广袤农村30多年改革的一段神奇历史);换言之,酝酿已久、势欲喷发的社会发展潜在活力亟需通过新话语及其孕育的新观念、新思维来“放闸”。而目前的突出问题却是:作为思想意识之反映的理论学术话语,其更新速率和表达范式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代社会现实不对称、与全球化多元文化交融和演进的新阶段不适应、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高要求不协调——这就是“话语问题”长期淤积下来的痼弊。在一定意义上说,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内在的深层思想观念障碍已经转化为了概念符号和话语表述的外在障碍,这就是令人感叹的“表达的艰难”。这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消极语用现象,尽管在不同学科领域内的表现程度不一,概而言之就

是理论学术话语范式转型的相对滞后,即概念符号和表述形式的蜕变迟缓和更为内在的语用主体创新意识薄弱所致,结果表现为表达力的衰微、批判力的消失和解释力的弱化。

所谓话语表达力的衰微,就是超越时空、不谐于新语境的公共表达、同质表达和泛化表达仍有普遍的生存空间,甚至在某些领域的特定语境中不乏泛滥之势。可以看到,一段时期以来学界流行的是简单套用外来话语或者传统固有话语,以致遗忘了“言说者是谁”、“为谁而言说”、“何语境言说”这种消极语用的现象频频发生,其表现正如有学者所警示的“言必称希腊”的无根话语难以禁绝^①。实际上具有自身特定文化内核的理论学术话语,显然难以完全套用生成于异域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现实——由此可以反推外在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思想现实的话语为何难以摆脱“水土不服”的表达困境。所谓批判力的消失,是指话语表达者不能坚持自我选择、独立取舍的思想立场,表面无“过”的掠影式描述貌似稳妥、实则缺乏思想力的尖锐“楔入”。即使是对传统主流话语或西方话语的“拿来”,也不能仅仅简单地平面“安放”在特定语境中的现实问题面前——恰恰相反,需要表达主体以“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透过表象而深入问题本质^②,显示出主体独立评论的思想锋芒。我们需要首先经过自身思维过滤的西方话语或面对具体问题的传统话语,它们可能曾经在一定时空条件下适合于彼时彼语境,但是都需要在此时此语境(即当代中国语境)中作出基于自主立场的“二度创造”——这就是问题语境中富有理性思维的独立评论。这种独立评论在开放的文化建设生态中是正常且积极的,可以引领思想创造力的释放。所谓解释力走弱,是指从传统或者异域语境中“捡拾”来的话语对当下不断生成着的复杂的“中国问题”愈来愈缺乏与时俱进的阐释效应。设若表述的话语无法对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中国问题”发挥具有针对性的积极效应,那么,理论学术的论著就可能丧失应有的品格甚至生命力,沦落在对改革现实的“外在”中而迷失自身的目标指向,异化为仅供书斋内把玩的某种“玄学”。

① 杨军:《学术“洋八股”必须禁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3日,第A05版。

② 俞正声在2014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中国网 http://news.china.com.cn/2014-03/04/content_31659526.htm。

例如,我们已经在实践中走出了具有东方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却未能提炼出与行为模式相配套、共识度高、获得国际公认的话语体系来予以深刻和新颖的阐释(即使国内学界对较为流行的“中国模式”及其特定内涵也尚存明显歧见,至于对“中国道路”之世界意义的提炼也是有待时日),尤其不能据此运用自己的话语符号来与西方发达国家展开从容不迫的平等对话。这样,“经济大国”与“话语弱国”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而由于话语表达力、批评力和解释力的这种衰微,必然削弱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影响力和思维主导权。

上述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汉语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不无尴尬的窘境。这种“话语问题”实际上凸显出目前深化改革时期全面解放思想的必然逻辑。我们自然联想到近年来令社会各界不断揣摩和玩味的“钱学森之问”。其实,解答这个追问学术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缺乏创新思维、创新人才的重大现实问题,最富有启发性的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教授。这位已经仙逝的百岁老者在临终之前通过视频向中国发出语重心长的忠告:中国需要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和谐、更具有可持续性^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速度尚滞后于运行在经济改革快车道上的“现实中国”,上述“话语问题”就是这种改革落差留下的一种“后遗症”——无疑,“思想中国”亟待源自“现实中国”而又超越变革实践的新话语体系来予以催生。

因此,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更趋深入和完善,面对西方世界以“软实力”(soft power)为话语代表的“核心英语”之强势渗透,我们应当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出发考虑锻造既有本土特点、又具普适价值、而且时代特色鲜明的“中国话语”(包括“中国概念”和“中国表述”)——它们既能代表当代中国文化创造的一种高度(比肩甚至超越儒家的“和文化”),又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自己原创和独特的思想贡献,以此才能应对所谓国际世界“文明的冲突”。诸如: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将崇高的内涵与质朴的表述融为一体,既有人类价值追求的共同基因(“梦”者,源自现实且超越现实的理想之谓,如 American Dream),更富中国民间对理想和幸福的憧憬色彩——这是富于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政治新概念。“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是李克强总理基于历史回顾和未来展望而作出的富有政治远见和学术涵养的专业新判断。最近,理论界人士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 24 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提炼出“一元化指导思想能在扩容中应对多元化社会”的结论^②——这是与时俱进、稳健积极、显见一种政治智慧的理论新表述。而在学术专业领域内,对于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和“新表述”的提炼,正愈来愈成为一种推动各领域学术思想进步的“学界时尚”。修辞学界在汲取邻近学科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言语行为”的重要概念^③。它是在一定人际交往的语境中,行为主体根据自己的意图而借助一定的媒介、结构出一个语段并使“他者”产生关联性反应的系统言语行为。显然,这个新概念本身已经融入或强化了后起语用学所注重的一些主要元素,即语境、表达意图、关联性反应等。甚至更有学者在追溯传统文化源流的基础上自觉意识到“关键词”(即重要概念的载体)是文化解密的金钥匙,从关键词诞生→成长→更新→再生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它们所承载的源远流长的文化生命历程,由此而提炼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关键词研究方法——“生命历程法”^④。这个新概念问世的本身,不仅对古典文化的研究是一种破其机枢的方法创新,而且对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创造性学术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方法论启迪。

上述形式不一、内涵深刻的典型“中国话语”,其主体无论是政治领袖或者学界精英,都充盈着一种时代的亲切感和智慧的魅力。凡是富于新质、持续升值的“中国话语”,就应该具有本土性和普适性兼备的鲜明包容特色(即“融通中外”),并蕴涵现实

① 罗纳德·科斯:《中国应该开放思想市场》。网易财经:<http://money.163.com/13/0116/18/8LC21MDI00254T39.html>。

②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一元化指导思想能在扩容中应对多元化社会》,http://www.求是理论网.cn/zz/wwwtj/201403/t20140317_330914.htm。

③ 李玉:《构筑中国语言学新概念新范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4日,第A01版。

④ 李建中:《关键词研究开启中华文化现代意义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4日,第B04版。

性、前瞻性和发展性互相贯通的久远成长价值。这样的理论学术“话语创新”，将能够释放出强大的持续增值的思想创造力，从而催生一个新意迭出、理论长青、活力永在的“思想中国”，并且推动被新思维、新理论所深刻洗礼的行为主体自觉地、观念化地对应于生机勃勃的“中国实践”——这才是“话语创新催生‘思想中国’”这个时代新命题在认识论和实践论双重意义上的本真内涵。如是意义上的“中国话语”，才是“中国思想”之名，而“中国思想”则构成“中国话语”之实，如此名实相称，必将创造“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新高度。这样一个崛起于伟大改革实践、矗立于人类历史峰巅的“思想中国”，这样一个孕育着时代精魂、喷涌着深沉理性精神的“魅力中国”，必将又对自身改革实践的深化而积极发挥思维创新、观念引领的战略导向作用，从而构建起观念与现实、思想与实践两者互动、循序渐进的辩证关系，可持续地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历程。这种辩证关系的构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理论→再实践这种创新世界的历史逻辑，也顺应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迎接挑战、全面发展的现实逻辑。既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认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①，那么，作为这种改变了的“新意识”、“新思想”指称的“新话语”之问世，难道不也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逻辑么？

四、话语体系创新与语用范式转换

如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创新理论学术的“话语体系”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捡拾闪烁思想灵光的“片言只语”，就应当从转换“语用范式”的战略高度入手，以期从整体上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语言表达风貌，突破以往那种很少触动思维神经的刻板化“消极陈述”范式。“范式”(paradigm)这一特定概念，为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 S. Kuhn)于20世纪60年代所创。在这个虽为古希腊已有的词中，库恩赋予了其科学哲学的新含义：范式就是体现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特殊内在结构的模型^②。在该结构

中，科学共同体成员具有同样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包括共同遵从的哲学观、行为观和方法观。库恩“范式论”也给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创意发展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启发。观照社会科学领域内所发生的具有实质内容的革命性变化，当亦是包括概念运用、思维逻辑、表达风格等要素在内的新旧语用范式之间的划时代转换，毕竟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标准化的“公共话语”已经基本被摒弃；换言之，撬动语用范式转型是全面达成话语体系深度创新的可能战略途径，由此推进社会科学各领域、各学科的学术思想朝纵深演绎和发展。

所谓语用范式(pragmatics paradigm)，是指一定历史背景下普遍的语言哲学观与相应具体的语言表达观之间的有机融合。其中，居于上位的语言哲学观规定了语用主体的价值理念和情感倾向，而具体的语言表达观(即语言行为观)则是在语言哲学观统领下对思维外化的具体认识和实施行为，决定着主体的语用品质及其创新程度。一定的语用范式反映着特定时代语言表达的精神特征和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理论学术领域学人们的话语产出质量。因此，转换语用范式的核心就是调适理论学术领域“话语主体”与“话语行为”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自觉地提升话语生产的创新品质，尤其是增强话语呈现的鲜活度、话语蕴含的丰厚度、话语价值的普适度和话语指向的发展度。如果表达主体在深读“中国问题”和感受当代实践的基础上而从心灵本位立场出发，那么，其表达行为就是有根之树、有源之流，其创新话语既是生命本质的必然象征、又是中国实践的概括反映，话语与思维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就有可能达到高度和谐的融合；反之，则不然。强调话语表达者独一无二的主体地位，实质就是从本源上注重话语表达的原创性——并由原创性而派生出表达的前瞻性、独特性、深刻性和开放性等一系列鲜活的话语品质，推动人类社会深远的文明积累和高度的文化繁荣。由是推论，真正创新生命话语的密钥就是确立并维护话语表达的主体地位、强化其话语原创的自觉意识——这也就是所谓话语范式转型的基本内涵，即表达者由机械化、标准化和同质化的“消极语用”走向基于独立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48页。

②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1页。

格与自主思考而创新概念和缜密推断的“积极语用”，构建起具有深厚思维含量且能洞开成长性思想空间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时代已经提供了这种宏观的背景条件，如何从语用范式转换的视角去实施催生中国思想力的恢弘人文工程，正值其时。针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和学术语境，一方面可以从主观上强化学术主体的创新理念、坚定其创新行为、拓宽其创新思路、优化其创新方法等环节着眼；另一方面可以从改善学术文化境遇、提升学术评价机制、构建学术成长平台等外在方面入手。这样，理念与行为统一、主观与客观结合，撬转语用范式从“消极”走向“积极”，激励理论和学术研究主体充分释放话语创新的充沛能量。

第一，高标核心观念：以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坚定话语主体的创新意志。这是就话语创新的哲学思维观而言的。核心是重树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观。新话语所表征的新观念、新思维正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具有显著的先导作用。思想的伟力与话语的创新构成逻辑的正比关系。历史新时期，对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的“科学技术”及其功能的认识遗留着极“左”思潮的深深烙印，并阻碍着当时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背景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一种新表述和新判断，凸显出不可估量的思想创造价值，极大地提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此类推，我们今天同样要旗帜鲜明地高标“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的朴素理念，如果说劳动者是生产力中“人的要素”，那么，新观念、新思维就是脑力劳动者自身的“价值要素”，而且，脑力劳动者这种软性的“价值要素”具有可供社会实践长期应用并预示不可估量的成长性增值前景，因此，比显性的科技设备和操作技能更具原初动力和持续增值的积极功能——追根溯源，发达的物质文明只是人类先进思想观念的自然成果，而人类先进的思想观念才是物质文明形态蜕变的“第一推动力”。马克思早就作出过这样精彩凝炼、颇耐回味的阐述：“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①“人的本质力量”即人的自由思想意志，它在现代社会中以“话语”承载和显现并作用于主体人复杂的实践对象。如果全社会都能营造“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这种民主和

开放的舆论氛围，形成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蕴含创造性精神的劳动这样一种全体公民的共识，那就会激励全国理论哲学社会科学界高标这种坚定的核心价值观念：以铸炼“新话语”为表征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估值很高、不容置疑的学术文化创造，其持续的积极效应更表现为祛除思维之蔽、释放源源不断的社会变革动能。这种积极向上、共识度高的核心价值观念，能够坚定哲学社会科学界同仁创新话语的强大意志，凝精聚神、排除认识干扰，且形成创新话语的坚韧实践合力。

第二，坚守逻辑起点：从真实的“中国问题”获得话语主体的创新灵感。这是就话语创新的实践源泉而言的。真实的“中国问题”是指源于改革实践、祛除认识之蔽并有可持续、成长性探讨前景的实然问题而不是被庸俗社会学或教条主义掩饰的“伪问题”。发现这样的问题是创新话语的基本前提。既然新话语是新思维的载体，那么新思维则是对真实的“中国问题”之直接揭示和破解；没有对“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的深度解读和凝神沉思，就不可能引发话语主体的创新灵感。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中期无疑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进步并为后续发展充分奠基的思想创新的“黄金期”，未来十年则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一段难趟的“深水区”——对这段不平凡历史的亲身经历与深入体验，本身就是研究主体的平凡人生与伟大时代相交集而获得的一笔非常难得、可供开发的话语创新资源；续之，基于“中华文明”发展的战略高度而予以深度品读和含英咀华，“开发”出富于前瞻性的真知灼见。这种内涵丰富的所谓“开发”包括提炼新概念、赋予新内涵、作出新判断、展开新思维等系列流程；换言之，通过严谨的心智活动而过滤表象、去芜存真、形成新知，这是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而获得话语创新灵感的基本途径。虽然有必要追根溯源、周视寰宇，但是首先需要守护本土意识、坚持现实立场、尊重“中国实践”，持之以恒地把立足改革前沿、聚焦改革问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学术话语创新的真正逻辑起点和丰富的灵感源泉。这里，实际上蕴含着对中外、古今和理实（理论和实践）三大关系的辩证考量，其间以“中国问题”作为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87页。

话语创新乃至理论学术建树的逻辑起点,也是作为把握三大关系、六种维度的“枢纽”。没有“中国问题”,即无“中国意识”;没有“中国意识”,即无“中国思维”和“中国理论”——更无创新“中国话语”的源源灵感可言。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意味隽永地道出了关于“问题”的真谛:“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理论学术研究中的质变和升华,往往表现为探索之心与现实问题“邂逅”时灵性思维的瞬间凸显:一种蕴含着新观念的创新话语出乎预期地照亮某一段混沌的“思想迷途”。感同身受的“中国问题”,不仅能够提供研究主体解疑祛惑、追本溯源的思想动力,也是创新话语的思想之源甚至是智慧之母。试想:如果没有对极“左”政治思潮长期阻碍社会发展这个特定“中国问题”的浸润式体验,没有由此而形成的萦绕心间、挥之不去的困惑和沉思,何来历史新时期发轫之际对于“思想解放”的自觉倡导和推动?何来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撬转中国社会发向度的新概念和新表述!由是言之,聚焦“中国问题”应当是创新“中国话语”的逻辑起点和内在线索。具言之,亟需在改革实践中发现蕴涵探究前景的真实的“中国问题”,培植对这种真问题敏锐的“发现”意识和深入的透视能力,以此为重要抓手来探寻思想解放、社会进步的正确路径。这样,对“中国问题”的聚焦则意味着从中可能提炼出具有成长性思想价值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走向理论学术思想体系创新的高境界。

第三,尊重学术个性:凭借研究主体的独特性孕育话语生产的原创价值。这是就话语创新主体的学术个性价值而言的。学术个性与学术共性存在着不可偏废的辩证关系。自由活泼、新鲜生动的学术个性当然基于严谨理性、规范有序的学术共性,但更要超越过度标准化的学术共性而走向活力横溢的创意。尤其要清醒地看到:“文革”时期极“左”政治思潮的不良遗风,迄今仍然一定程度上潜在地束缚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和话语出新,“套用”话语与个性话语、因袭思维与创新思维时有斑驳互现,致使研究主体的学术个性难以

充分自由地舒展。展望多元文化交融与博弈的全球化趋势,植根国家宪法精神和学术伦理道德之上的学术个性之自由生长,将是一种必然的文化发展前景。就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逻辑而言,尊重并弘扬学术个性就是话语创新之本。这种学术个性,包括研究主体的观察视角、思维路径、论证特点、表达气质和人文品质等。鲜明的学术个性是研究主体走向建设性成熟的一大标志,是其渐臻创造性化境的必备要素。特别需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这种“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基本精神^②,在恪守宪法基本原则和捍卫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鼓励研究主体自主培育和充分舒展自己的思维个性(包括思维视角、思维方式和思维品质)。解放具体的人,首先意味着解放作为智慧生命崇尚真理、孜孜以求的思维个性;进而言之,思维个性获得理性释放,正是表达个性获得升华、话语创新付诸实施的必要条件。总之,和谐开放的文化生态、自由宽松的时代条件,无疑是创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样一种鲜活生动局面的基本前提。因此,从活跃学术氛围、催生新鲜话语的逻辑路径出发,我们应该尊重和悦纳统一“规划”之外理论学术追求的自主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真正让研究主体的学术个性合情合理合法地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理论学术自由创造的精神空间。

第四,跨越学科本位:以国际学术大视野在传统学科的交叉领域、边缘领域拓展思维创新的“陌生空间”乃至“风险空间”,铸炼理论学术的“新话语”。这是就开辟话语创新的具体途径而言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伴随着知识更新周期的缩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发生着学科重组、视域融合这种革命性的深刻蜕变。这样,今天如以全球化的学术视野重新审视工业文明初期和中后期各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及其成熟后的衍生和演变,则当代“学科”群落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难以一一对应于传统“学科”固有概念及其内涵的种种迹象甚至是显著趋势,包括其知识范畴、认知边际、研究方法、操作媒介、发展流向以至本质规定。这种具体学科在知识体系、研究视角和思维方

① 马克思:《集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203页。

② 特约评论员:《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人民日报》,2014年2月12日。

法等诸多维度上“名”与“实”之间的不同时代落差,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历时性进步,必然要求学界重新梳理固有“学科”的传统内容和学理框架,这就表现为“知识嫁接”、“学科杂交”、“边际拓展”、“视界融合”、“学理贯通”等等,而这一切都无法绕避地指向“话语蜕变”的内在要求,进而可以在学理思想上开启一种颇具创意和深度、蕴含着再生希望的学术新旅。比较典型的就是位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顶端的哲学学科,由于其传统先验性的弱化而走下形而上的神坛并且日渐“普适”于社会科学其他应用学科和实践学科,以致于有学者敏锐惊呼“哲学已经失去自己的边界”^①——“后哲学时代”持续涌现出这类“嫁接学科”:“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语言哲学”、“语用哲学”等等。这种学科边际淡化、视界融通的全球学术文化流变的大趋势,逻辑地催生着跨学科界面上的“新话语”,诸如切入问题的新概念、承载路径的新范畴、拓宽论域的新判断等;而这种“新话语”、尤其是创意核心概念则成为未来学术文化“再出发”的逻辑起点,铺砌并延展着人类新学术长旅的思想道路。因此,更自觉地祛除传统学科本位主义倾向、更有力度地拓宽学科杂交的开放空间,显然正是开辟铸炼理论学术新话语的可能途径。简言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化的“再探险”并“再登高”,有待借助于“新话语”这种思想先驱的坚实精神足迹!

第五,强化智库建设:打造更多话语创新、特色鲜明的思想高地。这是就话语创新的学术组织建设而言的。智库(Think Tank)本是国家思想资源的主要“集散地”,是新话语及其承载的新观念和新思维的特殊“孵化室”。近年来,党和政府愈来愈关注如何发挥国家智库在增强文化软实力过程中的创造性功能。刘延东副总理明确将“提升中国话语权”与“贡献中国智慧”有机联系起来^②;教育部也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多元途径促进国家智库与民间智库的同步建设亦可摆上议事日程。智库建设模

式的多元化,即党校、社科院、高校和民间智库多系统并存的和谐生态,有利于社会智力资源的全面开发和利用,更好促进民间智力资源服务于国家学术文化发展的战略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彩演绎历史已经深刻地启发我们:经济改革的成功其实是获益于多元经济成分的融合与互补,取决于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全体公民之创造性能量的充分释放。党的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③。其实,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智库功能的同时,鼓励资质卓越、特色鲜明的民间智库之建设和完善,其意义当等同于在精神生产领域支持个私经济的崛起并发挥相应的积极作用:我们既要巩固体制内主流学术机构的主体地位,也要尊重并鼓励具有充分成长价值的民间智库的自然形成和发展壮大,从而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智库群落”,以期促进基于不同视角、不同背景、不同学术立场和表达风格的新话语之蓬勃诞生、交流、争鸣并且不断优化,在这种“头脑风暴”的升腾过程中激活“新新话语”的闪亮登场,从而以此构筑更多深具个性、风格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思想高地,使“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坚实地支撑起明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思想的创造性高度——而且,这可能也是引导少数传统智库走出固守学科本位、疏离变革现实、回避思想争鸣这种狭隘保守模式的有效途径,从而使之焕发出充沛的学术朝气、真正转到为国家培育战略洞察力和学术创造力这种思想资源上。

第六,褒奖原创成果:激励话语标新、引领时代思潮的大气之作。这是就优化话语创新的文化生态而言的。真正凝聚时代思想精华的卓越论著,必然呈现出别具匠心、蕴含不俗的独特表达风格,正是以此所凸显的话语品格深刻地表征着研究主体的思想含量、文化价值和意义,甚至昭示着其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学术生命力。可是,现有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评奖,惯于以统一和刚性的标准(包括

① 孙周兴:《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82页。

② 刘延东副总理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新华网 <http://www.news.cn/politics/2013-05/30/>。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6日 新华社电,第二部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刻板化的陈述模式)来“度量”学术论著,不利于研究者主体话语个性和话语风格的自主生长。我们常常看到某些重要的项目成果评审中,少有以新概念和新表述来承载新观念和新思维的扛鼎之作,以致高级别奖项“空缺”现象已经屡见不鲜(虽然其中原因复杂,而话语表达缺少鲜活气息和创意提炼亦是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当全面深化社会改革、学术文化思潮嬗变之际,如何激励具有成长性学术价值的话语创新之作,确乎亟需重设示范性的鲜明标杆——这就是语用范式转型中重建一种开放多元的评价标准。如果说“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就是话语创新的具体表达形式,那么,话语形态上这种分寸恰当、直击心灵的“另类”表达就是值得褒奖的重要标志。只要这种话语形态上的“另类”,与内在质地即“思想创新”保持必要的和谐度和一致性,那么,这种话语的“另类”就具有深沉的内涵和长远的示范价值——所谓评审成果、褒奖先进,其根本要旨在于光扬和彰显这种洋溢着话语的清新活力、激荡着心灵探求气息的“生命作品”,从而使之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标示的语用创新、思想探险的范例。这里,应当从根本上扭转对理论学术论著的传统评价观念:去“标准化”的文章体式,去“套路化”的话语规范。不一定沿袭迄今,就是规则;不一定积淀已深,就是范例。文到语言为止,固然偏颇;但是,文贵载“道”,亦非创新之途。“文”“质”彬彬,方是康庄大道——这种语言艺术审美创造中的“大道”,同样适用于学术性、思辨性和理论性文体或者语用行为的探索与创新。欲崇尚新思维,必先欣赏新话语、悦纳新话语、推崇新话语,最终玉成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学术界蔚为大观的语用新风尚——以新话语催生新思维、以新观念引领新时代!由是而言,“重铸新范”,时不我待。

第七,培育国家大刊:构建话语创新、催生思想的温馨“精神产床”。这是就话语创新的学术平台而言的。具有东方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大刊,其崇高与核心的学术使命当在玉成深具里程碑意义、成长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的“新话语”之诞生。故而大刊之“大”,不仅仅在于主办机构的行政级别之高,更是指一流刊物必备的自觉编辑理念、卓越学术品位和拔萃刊林的高迈气度,由此而在选题、组稿、设栏以至排版等一系列编辑环节上表现出非凡的眼力和襟怀。这样的编辑谋略和艺术,方能为新

话语及其孕育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提供顺利问世的“精神催产素”,而作为承载新概念和新命题的刊物自身,则可能在此过程中实现催生“思想中国”的非凡学术理想。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过度统一的话语生产机制和标准化的话语表达模式,包括刊物定位、话题选择、栏目设立、语体风格等方面存在着近乎工业生产流水线的物化规范,它们在积极规范思想成果表述品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颇富人文内涵、初现前瞻价值的“别样话语”的“瓶颈制约”。作为循环周期较短、感应时代敏捷的学术大刊,几乎是观察“改革中国”思想形象和精神脉络的一扇透明“视窗”,自然应当追求自己稳定的编辑风格,但是这种追求不应以弱化作者个体的表达特色和话语创新为代价,而是需要两者在互融互补中达成最佳的艺术平衡——悦纳成熟作者的话语个性,应该成为大刊物深入骨髓的自觉编辑理念,唯此,它才可能顺畅奉献出反映时代精神和科学思辨的最新学术话语。而且,刊物的顶层谋划和风格追求不应是在预设中一成不变的,置身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有学术使命感的大刊显然应具海涵气度和包容襟怀,特别是自觉主动地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社会思想风尚和理论学术创新的基本态势保持和谐一致。纵观当前学界刊林,在如何突破传统思维惯性、如何鼓励作者自觉运用基于中国改革实践问题的独特话语及其表述形式方面,依然存在着可以有所作为的伸展空间。诸如如何守护下列具有相当共识度的基本标准:尊重学术立场、悦纳思想百家、欣赏表达个性、力荐学界新人等等。刊物在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自然能够充分释放出作者才气横溢的话语个性及其孕育的创意思想活力。在实施中,重要的还不仅仅是优酬敢立新概念、善用新表述的大气之作,更需要国家在出版体制上保障将刊物的生存、发展与作者用新话语孕育新思想作为价值追求的创造性精神劳动融为一体,努力打造若干具有全球视野、卓越品位的世界级名刊,使之成为向人类世界贡献创造性“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的亮丽的“文化名片”(欣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正在资助“国优”期刊的基础上谋划如何培育世界名刊)——总之,唯有松动“小规矩”,方能形成“大境界”。因此,要同时给予刊物和作者自由创生新话语、充分演绎新理性的开放平台。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全方位深度转换理论学术主体的语用范式,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发展国家未来学术文化的强劲思想引擎,逻辑地开启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各学科的学术思想现代化——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语言强国”战略的核心命题之一,理所当然地构成中国社会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2014年6月,中国政府已经从语言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通过联合国“世界语言大会”而首次向全世界宣示了“语言能力建设”这一新概念和新命题^①,在此新形势下的创新中国理论学术话语无疑是其重中之重。天地万物,意识为先;千思万虑,话语为表。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讲话中的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评语很能引发我们对国家学术文化未来发展的热切遐

想:“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②这自然使我们联想到恩格斯关于西方文艺复兴的那个著名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术渊博方面的巨人。”^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思想巨人的崛起,必然以洋溢心灵智慧的创新话语为符号性的鲜明标志。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正期待着以理论学术创造力为内核的东方“巨人意识”的觉醒,期待着各领域、各学科的思想巨人来持续创造这个“中国梦”时代的鲜活话语。

“中国话语”创新之时,正是“思想中国”诞生之日!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蒋重跃 宋媛)

Discourse Innovation for Creating “Thought China”

PAN Yong

(School of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For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paid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to discourse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order to serve the overall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nevitabl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present time. Regarding to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re exists such “discourse problems” as being weak in expression, loose in critical power, and incompetent in explanatory power. It requires us to be on guard against the disadvantages of such discourse problems that would be harmful to the further liber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the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would interfere with the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For the current innova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it is a must to convert the pragmatic paradigm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o encourag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negative to the positive uses of discourse so as to protect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moral character and individuality embodiment of research subjects to foster a great “thought China”.

Keywords: discourse innovation; new discourse for new concept and new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 paradigm; “thought China”

- ① 记者宗河:《世界语言大会成果研讨座谈会召开》,《中国教育报》,2014年6月21日,第2版。由中方起草的《世界语言大会——苏州宣言》提出“语言能力建设”的新概念。无论在国家文化建设史上,还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这均是第一次。
-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第1版。
- ③ 恩格斯:《历史导论·导言》,《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